

40 年來中國學術界中葡關係研究之回顧與展望

金國平*

一、中葡關係研究回顧

1978 年底，隨着改革開放，中葡關係史研究進入了一個新歷史時期。現從幾個方面，擬對 40 年來關於中葡關係史研究的成果進行一番大致梳理和考察，並提出一些思考與展望，以供學界參考。

（一）中葡關係的定義及分期

中葡關係是中國最早的對外關係，也可以說是最重要的早期對外關係，乃至整個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對外關係之一。中葡關係不僅僅是簡單的雙邊關係，因葡萄牙曾經是一個橫跨四大洲的殖民地國，中國與其前殖民地在獨立前的關係都應該算在中葡關係範疇之內，包括它曾推行過殖民統治，但最終未成為符合其殖民地標準的澳門。中葡關係可分為兩個時期：1. 澳門開埠之前；2. 澳門開埠之後。前一時期的標誌是 1511 年葡萄牙人對東西交要津馬六甲的佔領。後一時期的標誌是 1557 年澳門的開埠。本文主要評述第一階段的研究情況，因為第二階段，即澳門學的研究成果異常豐富，需要一專文來加以論述。

（二）史料整理與研究

史料搜集、整理與出版是任何歷史研究的基礎。就中葡關係史的研究來說，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也受到了高度重視。改革開放前，只有兩種史料集，包括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編《帝國主義與中國海關第 6 編

* 暨南大學澳門研究院研究員。

中國海關與中葡里斯本草約》（科學出版社，1959年）和介子編《葡萄牙侵佔澳門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改革開放後，相關史料的發掘與整理出版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刊印了一大批文獻資料，為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進而對中葡關係的深入起到了推動和促進作用。主要出版物可列舉如下，南京大學歷史系編《中葡關係史參考資料》（南京大學出版社，1980年），薩安東（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主編、金國平漢譯《葡中關係史資料彙編》（澳門基金會、澳門大學，1996-2000年，10卷），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葡關係史資料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人民出版社，1999年，6卷），金國平《西力東漸——中葡早期接觸追昔》——“文獻注釋篇”（澳門基金會，2000年）譯介了中葡早期接觸的主要葡萄牙語文獻，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中葡關係檔案史料彙編》（中國檔案出版社，2000年），澳門文化局編《十六和十七世紀伊比利亞文學視野裏的中國景觀》（大象出版社，2003年），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北京大學、澳門理工學院編《清代外務部中外關係檔案史料叢編中葡關係卷》（中華書局，2004年），《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國駐廣州總領事館檔案》（廣東教育出版社，2009年），（葡萄牙）巴洛斯、（西班牙）艾斯加蘭蒂等著、何高濟譯《十六世紀葡萄牙文學中華帝國概述》（中華書局，2013年），等。

（三）主要學術著作

20世紀30年代為中葡關係研究的發軔期，代表作是周景濂《中葡外交史》（商務印書館，1936年）。該書雖冠名為《中葡外交史》，實際上，大部份篇章講的是16世紀初葉以來，葡萄牙商人東來，在中國東南沿海尋求貿易機會，最早在澳門定居的中葡交涉史及澳門發展史。1930年代中，張天澤在荷蘭完成了關於中葡早期通商的博士論文並得到了出版（荷蘭萊頓E.J. 布里爾有限公司1934年英文版）。他首次間接引用了部份葡萄牙文史料（張天澤著、王順彬、王志邦譯：《中葡通商研究》，華文出版社，2000年）。還有張維華的《明史佛郎機呂宋和蘭意大利亞傳注釋》（燕京大學哈佛燕京學社，1934年）和《明史歐洲四國傳注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對《明史佛郎機傳》進行了注釋。1940-1950年代為一小空白期。新

中國初創，百業待興，人們無暇顧及中葡歷史關係的研究，故無重要著作問世。1950 年末和 1960 年代初，出現了兩本史料集。1960-1970 年代又由於歷次政治運動，學界對中葡關係的研究噤若寒蟬，無人問津。此間有為數不多的關於中葡關係的論文。專著與論文數量之少說明，中葡兩國之間交往雖有五個世紀的歷史，更有澳門這個交匯點，但是中國學術界對於中葡關係歷史的研究，並未給予應有的重視。總之，改革開放之前的中葡關係研究，由於歷次政治運動的干擾，鮮有深入的研究，因此，有影響力、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並不多見。至 1970 年代中文革結束，基本上是這種情況。改革開放後，這種局面得到了改觀，更因中葡關於澳門回歸的談判，極大地促進了中葡關係和澳門的史研究。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是戴裔煊，著作有《〈明史·佛郎機傳〉箋正》（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 年）及“關於澳門歷史上所謂趕走海盜問題”一文，¹ 主要的學者還有鄧開頌、黃啓臣、黃鴻釗及費成康等。而專以中葡早期接觸為研究內容的著作有吳志良《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澳門成人教育學會，1998 年）和《澳門政治發展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 年），金國平《中葡史地關係考證》（澳門基金會，2000 年）和《西力東漸：中葡早期接觸追昔》。萬明撰有一組關於早期中國、葡萄牙及澳門歷史關係的論文，包括“西方漢學的萌芽時期——葡萄牙人對中國的記述”、² “試論明代澳門的治理形態”、³ “明朝政府對澳門的管理述論”⁴ 及“西方叩關與葡萄牙佔據澳門”⁵ 等，廣泛地涉及了早期中葡關係。後擴充出版《早期中葡關係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年）。從 20 世紀 80 年代起，關於葡萄牙的著作逐漸呈現了多樣化，但總體來看，翻譯及描述性著作居多，而分析性著述偏少。

¹ 戴裔煊：“關於澳門歷史上所謂趕走海盜問題”，蔡鴻生編：《戴裔煊文集》，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 年。

² 《世界漢學》1998 年第 1 期，第 141-149 頁。

³ 《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9 年第 2 期，第 29-43 及 120 頁。

⁴ 《明史研究》1999 年第 0 期，第 132-140 頁。

⁵ 《北京行政學院學報》1999 年第 4 期，第 63-66 頁。

二、中葡初期接觸史研究

(一) 政治外交

1. 相遇南洋

“發現”中國是葡萄牙東來的主要目標。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D. Manuel）於 1508 年 1 月 13 日，向艦隊司令塞克拉發出指令，要求他調查中國國情，包括地理位置、風俗人情、宗教信仰、出口商品等情況，為同中國進行貿易交流做準備。葡萄牙人於 1510 年在印度果阿建立起了東方殖民的大本營。早期中葡關係不是發生在中國境內，而是在馬六甲產生了接觸。根據葡萄牙文資料，最早的相識發生於 1509 年；1511 年，葡萄牙人控制了溝通太平洋與印度洋的馬六甲海峽；1513 年，歐維士（Jorge Álvares）首航東涌；1516-1517 年，拉法爾·普雷斯特羅（Rafael Prestelo）再至東涌；1516 年，皮萊資（Tomé Pires）以大使身份在廣州登陸，中葡正式關係拉開了序幕。

2. 明朝來使

外交關係的主要內容是遣使。明代葡萄牙僅向中國派出了一次正式使團。在葡萄牙人看來，來使具有大使級別，但在中國官方眼中，來朝者均為貢使。第一個大使是皮萊資（Tomé Pires）。葡萄牙人恐怕以葡萄牙的名義來朝，不為中方所接受，因為它不在貢國之列，因此，在中國的官方記載中留下的記載是火者亞三為大使。實際上，此次使團有兩個大使：葡萄牙方面真正的大使皮萊資和介紹給中方的大使——火者亞三。金國平和吳志良的“一個以華人充任大使的葡萄牙使團——皮萊資和火者亞三新考”⁶一文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詳細的考證。由於史料記載過簡，各種推論似缺乏根據，“火者亞三”的確切身份一直未能澄清，尤其是其漢名及籍貫失考。隨後，二位作者又從明代東洞庭山人張本的筆記的《五湖漫聞》中考證出了火者亞三的籍貫及漢名——“東洞庭傅永紀”。⁷

⁶ 吳志良：《早期澳門史論》，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342-387 頁。

⁷ 金國平、吳志良：“‘火者亞三’生平考略——傳說與事實”，《明史研究論叢》2012 年第 10 期，第 226-244 頁。

3. 清朝來使

清代共有三次葡萄牙出使。在清朝期間葡萄牙出使的次數上，各位學者的看法分歧較大，周景濂認為是四次，⁸ 萬明主張五次，⁹ 薩安東則提出是六次。¹⁰ 在瑪訥撒爾達聶（1667年），麥德樂（1726年）和巴哲格（1752年）三個使團上的意見一致。分歧在本多·白壘拉（1678年）和斐拉理（1720年）兩次。筆者認為，本多·白壘拉使團是瑪訥撒爾達聶使團的後續，不應單獨算。儘管中國官方有記載，但因為是澳門政府所為，葡萄牙並未將其列入18世紀的正式出使中。至於斐拉理（Onorato Ferrais）出使，似有疑問。我們查閱了葡萄牙方面資料，未見有對此次出使的任何記錄，漢籍卻言之鑿鑿。原來此人不是葡萄牙的使節。他率領一團人馬來京是為教皇特使嘉樂（Jean Ambroise Mezzabarba）來打前站。迄今為止，關於葡萄牙使團的研究，主要是根據中國官書中的記載。英語著作，偶有引用。葡萄牙方面的著作，除萬明等少數幾個學者的引用外，徵引略嫌不足。金國平在《中葡史地關係考證》中，翻譯出版了清朝三次正式出使的報告，包括“葡萄牙國王遣中華及韃靼皇帝特使瑪訥撒爾達聶使京廷簡記（1667-1670）廣州啓程錄”（第167-198頁）、“葡萄牙國王唐·若昂五世遣中華及韃靼雍正皇帝特使出使簡記”（第199-211頁）和“巴哲格大使敬呈唐·若澤一國王報告1752年出使京廷記”（第212-240頁）。這些報告對出使目的，人員的構成、禮品單、旅行過程、在澳門和北京受到的接待等情況有比較詳細而明確的描寫。從研究的現狀來看，關於這幾次出使，一般的中葡關係及澳門通史類著作均有涉及，但多數屬日誌式的敘述，缺乏細部的研究，而這些報告正是為個性化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素材。總之，在中葡官方文件中有紀錄的五次使團是：皮萊資（1516年），瑪訥撒爾達聶（Manuel de Saldanha，1667年）、本多·白壘拉（Bento Pereira de Faria，1678年）、麥德樂（Metelo de Sousa e Menezes，1726年）和巴哲格（Francisco de Assis Pacheco de Sampaio，1752年）。

⁸ 周景濂編著：《中葡外交史》，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155-160頁。

⁹ 萬明：《早期中葡關係史》，第258-296頁。

¹⁰ 薩安東：“神父或貴族？葡萄牙關於18世紀遣華外交使性質的官方討論”，卓新平主編：《相遇與對話：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30頁。

（二）葡萄牙人在華南的足跡

1521-1522年中葡海上武裝衝突後，葡萄牙官方對華貿易暫告中斷。香港屯門之戰和澳門西草灣之戰後，廣東厲行海禁，驅逐葡人，迫使他們轉到浙閩沿海活動。1533年以後，葡萄牙私商不絕於浙閩濱海。1548年，雙嶼港被明軍收復。1549年，葡萄牙人轉往福建漳州月港和浯嶼，又遭驅逐。1549-1550年間退居位於西江口的三洲（上川）。1554年，過渡到浪白滯。1557年，澳門正式開埠。

1. “Tamão”

“Tamão”是葡萄牙人歐維士初抵中國之地。¹¹ 長期以來，關於這個地點考證各說繁多。通常認為，“Tamão”是“屯門”的對音。此考不誤，但“Tamão”的所指卻不是屯門。葡萄牙史料中的“*I. de Tamão*（屯門島）”是指大嶼山或赤瀝角島（今香港機場所在地）。筆者認為，指赤瀝角島的可能性為大，因為它比較小，易於瞭望，長於防守，是一比較理想的泊地。葡萄牙人筆下的“*Porto de Tamão*（屯門港）”不是指屯門水道，而是指大嶼山和原赤瀝角島之間被稱為“東西涌”的水道形成的港口。在葡萄牙航海資料中留下的名稱是“*Tonqion*（東涌）”。¹² 中文資料方面，大英圖書館藏《全海圖注》寫本和中國國家圖書館存《全海圖注》1591年序刊本上，有“東涌”。《廣東海防匯覽》指出：“大嶼山孤懸海外，內有大澳，東涌二虎。其東涌與西涌兩港通流，港外水深八九尺，內水深三丈。又，赤瀝角，一山斜蔽於前，最為孤僻，容易藏奸。”¹³ 外文資料方面，在1542年《*Islario general del Mundo*（世界島嶼總圖集）》手稿中出現了“聖克魯斯（*Santa Cruz*）字眼和聖克魯斯（*Isla de Santa Cruz*）島”。葡萄牙的“發現紀念物（*padrão*）”一般都是石質或木制十字架。這樣看來，1513年歐維士在東涌樹立的“發現碑”，即《新安縣志》所記載的“圖形立石”，一定是一塊頂端有十字架的

¹¹ 路易士·凱尤（*Luís Keil*）著，李飛譯：《歐維士——第一個到中國的葡萄牙人（1513）》，澳門文化學會，1990年。

¹² 原始資料可見金國平編譯：《西方澳門史料選萃 15-16世紀》，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2-44頁；及金國平：“從西方航海技術資料考 *Tumon* 之名實”，《中西文化研究》2002年第1期，第138-147頁。

¹³（清）盧坤、（清）鄧廷楨主編，王宏斌等校點：《廣東海防匯覽》，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頁。

石碑。我們認為，極有可能“聖克魯斯島（聖十字架島）”就是樹立十字架發現碑的地方的實際地點，即東涌之北的赤瀝角島。在更早的 1529 年里貝羅世界標準上已標有“y^a. de S. Cruz（聖克魯斯島〈聖十字架島〉）”。

2. 西草灣

1521 年的中葡屯門軍事衝突後，又於 1522 年 4 月年，雙方在西草灣發生了戰事。¹⁴ 當時參戰的葡萄牙船長末兒丁·甫思·多·滅兒致葡萄牙國王的函件還存世可查。¹⁵ 因《明實錄》載稱“新會西草灣”，故長期以來，學術界把考證的重點放在新會。歷史上，西草灣在行政上屬香山縣的管轄範圍，但軍事上，屬新會。《明實錄》是從衛所的角度看問題，所以留下了載稱“新會西草灣”的記載。據《全海圖注》的標示，西草灣在澳門以南，就在澳門沙瀝的範圍內。西草灣的確定有着重要的意義，說明從 1522 年起，葡萄牙人已經在澳門一帶海面活動了。換言之，至其時葡萄牙人已經瞭解了澳門的情況。

3. “Liampó”

珠江口衝突後，葡萄牙人開始北上。約在 16 世紀 20 年代，進入“Liampó”，使它成為了“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個重要節點和主要平台，展開了同東亞、東南亞國家和地區十分繁盛的貿易。早在 20 世紀 40 年代，方豪便正確地將“Liampó”考證為雙嶼。¹⁶ “Liampó”是“Niampo”寧波的變音。包江雁主編了《雙嶼港研究》（文津出版社，2001 年）。2018 年，貝武權、金國平發表了“從雙嶼門到澳門——〈浙江省沿海圖說〉揭開‘雙嶼港’面紗”。¹⁷ 2018 年，金國平、貝武權出版了《雙嶼港史料選編》（4 卷：中文卷、法英文卷、葡西文卷和日文卷）（海洋出版社，2018 年）。這套多語種史料集的出版為雙嶼港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更廣闊和堅實的資料基

¹⁴ 金國平：“1521-1522 年間中葡軍事衝突：‘西草灣’試考”，龔纓晏編：《20 世紀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研究集萃》，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 年，第 596-609 頁。

¹⁵ 金國平編譯：《西方澳門史料選萃 15-16 世紀》，第 35-42 頁。

¹⁶ 方豪：“十六世紀我國通商港 Liampo 位置考”，《復旦學報》1947 年第 1 期，第 53-77 頁。

¹⁷ 寧波中國港口博物館、寧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編著：《歷史視野下的港城互動——首屆“港通天下”國際港口文化論壇文集》，科學出版社，2018 年，第 110-122 頁。

礎，將彌補以前徵引文獻的局限，加大學術詮釋與提升的空間。同年，水銀在《天下開港：寧波港人文地理史述考》（寧波出版社，2018年）一書中斷言：“我認為用 Syongicam 指舟山群島可，但指小小的雙嶼或雙嶼港，不可。（第 163 頁）”至於不可的理由，僅僅因為林旭登（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所提供的緯度大略相當於今舟山的緯度。我們看到，“Syongicam”這一拼法無疑是“雙嶼港”。提到林旭登，作者有一段論述：“現在所見的西方文獻史料，有關葡萄牙人在 Liampo 一帶的貿易基地介紹，以林旭登和平托的著述最接近一手貨。但這二位都在剛剛走到‘門口’時戛然而止，明明接下來應該說貿易地叫甚麼或甚麼島了，卻都生生咽下，偏偏不說，只以距離多少而含糊其詞（林旭登說距 Chaposy 18 mylen 處，平托說距 3 里格遠）。說到底，這二位其實也不大清楚（第 168 頁）”。這不免有些文學味道的敘述反映了他並不知林從未涉足雙嶼，其書史源均來自葡萄牙人的資料。他多次引用林旭登，但為何只用我們譯介的“Syongicam”，而根本不提林書中出現的其他書寫形式。他大量引用了平托《遠遊記》中關於“Liampo”一帶的描述，做了分析和判斷，得出了這樣的結論：“……《遠遊記》中至少法里亞到 Liampoo 之前的這一段故事，是平托虛構的傳奇，不是史實；諾烏台、廷勞河、尼八發、伊諾爾、科莫倫等地名根本就是無從捉摸的子虛烏有。（第 64 頁）”。可惜的是，他並不知道《遠遊記》的性質——遊記文學。對此，我們在《遠遊記》中譯本的譯序中已有指出。所以我們在出版《雙嶼港史料選編》時，把《遠遊記》的有關章節作為附錄收入。從歷史地理的角度來考實一部文學作品的地名實乃無用功。此書中諸如此類的硬傷不勝枚舉，在此從略。基於上述分析，此書是不是一部學術著作應由學者和讀者來判斷。貝武權在《舟山絲路話語——舟山海上絲綢之路研究》（團結出版社，2019年）第 103-148 頁中對“Liampo”進行了研究。關於雙嶼的研究，龔纓晏和楊靖有一評述。¹⁸ 研究過雙嶼/Liampó 者還有林梅村、毛德傳、王建富、王文洪、方普兒、翁聖成、廖大珂等。

我們認為，從性質上來講，雙嶼是一個短暫海上私人貿易基地。在葡萄牙人“發現”日本之後，成為了重要的葡日貿易中繼站。葡萄牙人在雙嶼只是暫住，沒有過平托描寫的那些機構和建築。

¹⁸ 龔纓晏、楊靖：“近年來 Liampo、雙嶼研究述評”，《中國史研究動態》2004 年第 4 期，第 13-19 頁。

4. “Lamao”

這個詞在葡語中有多種拼寫，如“Lamão”、“Lamao”、“Lamau”、“Lamon”、“Lamo”和“Lamho”等形式。現在多作“Lamao”。“L”與“N”的互用是一常見的語言現象，因此“Lamho”實際上是“Namho”。若將“Namho”分為“Nam—ho”，我們得到的是十分接近“nan ao”的音值。迄今為止，利用了葡萄牙語資料，對南澳歷史進行了研究的有湯開建、陳文源“明代南澳史事初探”，¹⁹ 金國平“南澳三考”，²⁰ 胡寶柱、肖文帥、普塔克“明永樂至隆慶南澳的海上活動：早期葡文資料中的南澳島”²¹ 和廖大珂“16-19世紀初西方文獻中的南澳”，²² 等。

5. “Chincheo”

葡語中有諸多拼寫形式，但現作“Chincheu”。在此形式之前，多作“Chincheo”。此詞從語音上來分析，在菲律賓出版的西班牙語——閩南語字典中，明確地標為“Chincheo—漳州”，另外，在羅明堅《大明圖志》中，泉州和漳州的標音有異。因此，可以確定“Chincheo”是指漳州，而不是指泉州。²³ 楊國楨“葡萄牙人在‘Chincheo’：16世紀海洋史的一件公案”²⁴ 及“葡萄牙人‘Chincheo’貿易居留地探尋”²⁵ 比較全面地探討了這個問題，但所引用的外文資料略顯不足。從地圖方面研究“Chincheo”的論文，可見廖大珂、輝明“16-18世紀初歐洲地圖中的‘Chincheo’港”²⁶ 和徐曉望“葡萄牙人地圖上的‘Chincheo’”²⁷ 最新研究有陳宗仁“《全海圖注》的與福建海商：兼論16世紀葡文獻中的‘Chincheo’”²⁸

¹⁹ 《潮學研究》（第3輯），汕頭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48-65頁。

²⁰ 金國平著/譯：《西力東漸——中葡早期接觸追昔》，第74-82頁。

²¹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編：《海交史研究》2014年第1期，第90-91頁。

²² 《國家航海》2013年第3期，第44-74頁。

²³ 譚宗華（Ch. R. Boxer）：“1. ‘Chincheo’泉州和漳州”，（葡）伯來拉（Galeote Pereira）等著、何高濟譯：《南明行紀》，中國工人出版社，2000年，第293-303頁。此文雖考證頗詳，但未有定論。

²⁴ 《閩在海中》，海洋出版社，2018年，第265-279頁。

²⁵ 《瀛海方程：中國海洋發展理論和歷史文化》，海洋出版社，2008年，第265-279頁。

²⁶ 《中國史研究》2013年第1期，第159-176頁。

²⁷ 徐曉望：《明代前期福建史1368-1521》，線裝書局，2017年，第298-300頁。

²⁸ 金國平主編、楊迅凌副主編：《〈全海圖注〉研究》，澳門基金會，2021年。

6. “Sanchoão”

聖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co de Xavier）於 1552 年 10 月 22 日發出的一封信中的落款地點是“Sanchoão”（這是已知葡語中最早的書寫形式）。1557 年出現了“Samcheo”的形式。1648 年波蘭籍耶穌會神父卜彌格繪製《大震旦圖》中第 17 圖中標示了“三洲，俗稱上川”。大英圖書館藏《全海圖注》寫本和中國國家圖書館存《全海圖注》1591 年序刊本上，均作“三洲山”和“三洲澳（亦稱“三洲環”、“三洲灣”或“三洲塘”）”。“Sanchoão”和後來的“Samcheo”及各種異寫都是三洲地對音。²⁹ 從 2005 年開始，我們已經開始使用三洲一名。³⁰ 葡萄牙人為了便於他們的記憶和發音，採用了他們母語中一聖人——聖若昂（São João）的名字來拼讀三洲。

7. “Lampacao”

涉及“Lampacao”的老一輩學者有張天澤、張星烺、郭廷以、梁嘉彬、岑仲勉、方豪和周景濂等。改革開放以後，最早運用中國史料和間接外文史料來研究浪白的有戴裔煊、³¹ 費成康³² 和黃啓臣³³ 等。趙立人就該問題進行過敘述。³⁴ 湯開建較全面地論述了這個課題。³⁵ 吳志良梳理了關於浪白滯的各種中西歷史資料。³⁶ 金國平“Lampacau 史地範圍考”從中西史料出發，詳細考證了浪白滯史地範圍。³⁷ 金國平“《大明國圖志》中的澳門學信息：以浪白滯為例”介紹和分析了羅明堅《大明國圖志》中有關浪白滯的資訊。³⁸

²⁹ 詳細考證，可見金國平：“São João、St. John 詞源考”，《中葡關係史地考證》，澳門基金會，2000 年，第 272-279 頁。

³⁰ 金國平編譯：《西方澳門史料選萃 15-16 世紀》，第 16-71 頁。

³¹ 戴裔煊：《〈明史·佛郎機傳〉箋正》，第 51-52 頁，以及“關於澳門歷史上所謂趕走海盜問題”，蔡鴻生編：《戴裔煊文集》，第 215-216 頁。

³² 費成康：《澳門四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14-16 頁。

³³ 黃啓臣：《澳門歷史》，澳門史學會，1995 年，第 39-40 頁。

³⁴ 趙立人：“葡萄牙人在廣東沿海早期活動的地點”，《海交史研究》1993 年第 2 期，第 89-90 頁。

³⁵ 湯開建：《明清士大夫與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 年，第 8-11 頁。

³⁶ 吳志良：《澳門政治發展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 年，第 31-33 頁。

³⁷ 金國平：《中葡關係史地考證》，第 254-271 頁。

³⁸ 姚京明、郝雨凡：《羅明堅〈中國地圖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文化局，2014 年，第 30-39 頁。原始資料可見金國平編譯：《西方澳門史料選萃 15-16 世紀》，第 72-74 頁。

（三）軍事技術的傳播

在古代中國，來自周邊，尤其是未知外國的軍事壓力催生了中原王朝被動的軍事引進。引入並不總是在和平環境下發生。衝突為引進途徑之一，尤其是軍事技術的轉移。中葡之間的軍事技術的傳播形成於早期在珠江口的軍事衝突。最著名的“技術轉讓”的例子是對葡萄牙人裝備（不一定是葡萄牙製造）的“利炮”和“堅船”的引進、仿製與運用。這構成早期中葡軍事技術交流的主要內容。

1. “利炮”

（1）佛郎機

佛郎機銃／子母銃（berço）為歐洲 15-18 世紀最為流行的火器。“佛郎機銃”一名初僅指一特定炮種。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將其運用到海船上，用於征服和擴張殖民地。葡萄牙人對火器的使用和傳播有嚴格規定。嚴禁私人買賣。傳播途徑主要是戰爭中的繳獲、逃兵攜帶和技術人員私自傳授等，還有通過傳教士的播散。在後一情況下，教諭規定，只可以傳播給教徒，用於自衛。按照此明文禁令，入華的耶穌會士幫助明清兩朝製造火炮是嚴重違反教規的行為。中葡關係內的擴散是通過戰爭繳獲（1521 年的屯門海戰和 1522 年的西草灣之戰）和收買通曉鑄炮技術的華人（如嘉靖年間的楊三、戴明等人）兩條途徑來實現的。關於佛郎機和佛郎機銃的葡萄牙文原始資料，可見金國平《西方澳門史料選萃 15-16 世紀》（第 2-4 頁）。金國平“*The Selden Map of China* 中‘化人’略析——兼考‘佛郎機’與‘佛郎機國’”。³⁹ 研究佛郎機銃重要的論文有：1. 林文照、郭永芳“佛郎機銃最早傳入中國的時間考”。⁴⁰ 林、郭文據《籌海圖編》（1562 年）所引的顧應祥語，在深入的論述的基礎上，考定佛郎機火銃最早傳入中國的時間為正德十二年。2. 李斌“關於明朝與佛郎機銃最初接觸的新史料”。⁴¹ 李文出色地考證出《籌海圖編》中所錄的顧應祥語實本於顧氏之筆記《靜虛齋惜陰錄》。

³⁹ 《明史研究論叢》，第 12 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14 年，第 209-223 頁。最新版本可見金國平的《“中國大帆船”與“絲銀之路”——Parían 研究》，暨南大學澳門研究院、澳門基金會，2021 年，第 36-53 頁。

⁴⁰ 《自然科學史研究》1984 年第 3 卷，第 4 期，第 372-377 頁。

⁴¹ 《九州學刊》1994 年第 6 卷，第 3 期，第 105-112 頁。

3. 鄭誠發表了“從佛郎機到葉公炮——明代後期火器技術之演變”。⁴² 而專著首推周維強的《佛郎機銃在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作者在中外資料的基礎上，以深闊博學的筆觸和迭出的新見研討了在世界軍事史中唯一一個獨特而深刻、對中國影響至深的個案。我們注意到，此書被美國學者歐陽泰（Tonio Andrade）的新書《從丹藥到槍炮世界史上的中國軍事格局》奉為佳作，大量引用。此外，還有馮震宇的《明末西方傳華火器技術研究》（山西經濟出版社，2016年）可資參考。在火器史範疇內的著作有劉旭的《中國古代火炮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和王兆春的《中國火器史》（軍事科學出版社，1991年）及王兆春的《中國火器通史》（武漢大學出版社，2015年）。還有兩本宏觀敘事著作不得不提。1. 李伯重獲韓國“坡州圖書獎”的《火槍與帳簿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與東亞世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以全球史的新視野，從早期軍事全球化、晚明的軍事變革，以及早期經濟全球化時期東亞軍事改革成果的比較這幾個方面，生動而有趣地為我們描述了火器在中國早期全球化中的作用。全書視野宏闊，文筆深入淺出，引人入勝，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兼顧史學研究的專業性與大眾接受的通俗性的暢銷書。2. 歐陽泰榮獲美國軍事史學會 2017 年傑出圖書獎的《從丹藥到槍炮世界史上的中國軍事格局》（中信出版社，2019年），此書史料詳實，文筆生動，條理清晰，論述精當。創新地回答了：為甚麼歐洲研發了值得中國引進的先進火炮？這足以讓我們思考西方如何崛起，中國又是如何“停滯”的命題。

（2）“發煩”

關於“發煩”的詞源，王兆春認為是來自英文槍字“gun”的讀音而創造的一個漢字。⁴³ 事實上，“發煩”的詞源已有確考。鄭誠在 2013 年便成功地考證出了“發煩”詞源是葡萄牙語“falcão”。⁴⁴ 同年孫建偉撰有“《漢語大字典》‘煩’、‘煩’考辨”一文，⁴⁵ 很好地從漢語史料的角度，解釋了“煩”與“煩”的語義。“falcão”在葡萄牙文中的意思是“隼”或“獵隼”。在中

⁴²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日本東方學會、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編：《第七屆中日學者中國古代史論壇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285-335頁。

⁴³ 《中國火器通史》，武漢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37頁，注釋2。

⁴⁴ 鄭誠：“發煩考——16世紀傳華的歐式前裝火炮及其演變”，《自然科學史研究》第32卷第4期，2013年，第504-522頁。

⁴⁵ 《勵耘語言學刊》2013年第2期，第117-119頁。

國古代軍事著作中，“falcão”被音譯作了“發煩”，其意譯是“隼銃”。“falcão”的指小形式“falconete”，是“berço（子母銃）”的另一名稱，就是大名鼎鼎的“佛郎機（子母銃）”。

（3）“紅夷炮”

“紅夷”者，明朝稱荷蘭人之名。“紅夷炮”意即荷蘭人之炮，故多有學者認為此炮係從荷蘭人處傳入。具體途徑是在 17 世紀初年，經澳門輸明。在澳門學、中國火器史、乃至明史研究中，似乎已經蓋棺論定，但隨着研究的細化，何者稱“紅夷炮”、何者為其原型、何時入華及何時被仿造又被提了出來。我們在研究中發現，《籌海圖編》中的插圖“銅發煩”，與里斯本軍事博物館所收藏的“falcão”的形制出入頗大。“銅發煩”外形粗短，且尾部向炮口呈一定的喇叭形，裝有尾珠，而“falcão”外形狹長，且無明顯的錐度。從這些外觀特徵來分析，“falcão”應該不是“發煩”原型。我們發現，《籌海圖編》中的“銅發煩”的外形，與同館收藏的“sacre”最相近。在葡萄牙語中，“sacre”的全名是“falcão-sacre”。學名作“*Falco cherrug*”，英語作“Saker falcon”。漢譯獵隼。為了區別於“佛郎機（子母銃）”和小號的“falcão-sacre（鷹隼銃）”，葡萄牙文中有“falconete de berço（小鷹隼銃）”的說法。“小鷹隼銃”屬一種發射實心鐵質彈丸的小型蛇銃。蛇銃可分標準蛇銃（colubrinas legítimas）、非標準蛇銃（colubrinas bastardas）、半蛇銃（meias colubrinas）和鷹隼銃（sacres）四種。鷹隼銃（sacre）也稱三分之一蛇銃（Tercio de culebrina）。鷹隼銃為蛇銃中最小者。鷹隼銃為前膛炮，主要用於攻擊敵船和陸上目標。《籌海圖編》之《銅發煩》圖注曰：“每座約重五百斤，用鉛子一百個，每個約重四斤，此攻城之利器也。”從“此攻城之利器也”一語來看，可以判定，“發煩”的原型不是“falcão”，而是“falcão-sacre”。《籌海圖編》的插圖是幅素描圖，但我們可以在長城博物館所展示的一尊製造於崇禎元年的“捷勝飛空滅虜安邊發煩神炮”上看到實物形狀。如果說《籌海圖編》的插圖僅為示意，那麼長城博物館的藏品無疑地證實了“發煩”仿自“falcão-sacre”。何汝賓《兵錄》、《西洋火攻神器說》和《西法神機》等均譯作“鷹隼銃”，且列入攻銃類。這個譯名十分準確。“falcão”是隼科之意，“sacre”言獵鷹。可以得出的結論是：“紅夷炮”早在嘉靖年間就已經被中國人仿製。其構造是前裝滑膛火門點火型。《籌海圖編》上的“發煩”真正的稱謂應該是“鷹隼銃”。“發煩”一名初僅指一特定

炮種。經過了大量的本地化仿造後，推陳出新，品名繁多，於是便成了前裝炮的泛稱。關於“紅夷炮”的主要論述可見王兆春的系列軍事史和火炮史及劉旭的書籍，尤其是湯開建《委黎多〈報效始末疏〉箋正》。⁴⁶ 主要論文包括有：李映發“明末對紅夷炮的引進與發展”，⁴⁷ 劉鴻亮“明清王朝紅夷大炮的盛衰史及其問題研究”，⁴⁸ 湯開建“萬曆四十八年紅夷船沉陽江始末考——兼談紅夷大炮早期入華問題”，⁴⁹ 金國平、吳志良“努爾哈赤死因真相新證”⁵⁰ 及周孝雷“明代廣東的海防軍器及其修貯基地”⁵¹ 等。研究“紅夷大炮”最著力和最有成就者為台灣黃一農先生，可參考其一系列有關論文及著作。關於“鷹隼銃”的主要著作有王兆春的《圖說世界火器史》、⁵² 尹曉冬《16-17世紀明末清初西方火器技術向中國的轉移》、⁵³ 馮震宇《明末西方傳華火器技術研究》⁵⁴ 和金國平主編、楊迅凌副主編《〈全海圖注〉研究》等。主要論文有鄭誠“《祝融佐理》考——明末西法炮學著作之源流”。⁵⁵ 關於明清戰爭中，葡萄牙在澳門造炮和通過澳門向明朝提供火炮的巨大作用，可見金國平、吳志良“澳門博卡羅鑄炮場之始終”⁵⁶ 及“努爾哈赤死因真相新證”。⁵⁷ 關於葡萄牙通過澳門向明朝提供軍援的事跡，見董少新、黃一農“崇禎年間招募葡兵新考”。⁵⁸ 關於佛郎機最早何時傳入中國的問題，尚有三個訴訟不絕的公案：1. 趙士楨在《神器譜》中說：“大銃有國初頒發邊鎮三將軍，征交趾所得佛郎機”。“征交趾”是永樂年間事。2. 陳壽祺《福建通志·明外記》載，正德五年（1510年），有“廣東盜”入犯仙游

⁴⁶ 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0-111頁。

⁴⁷ 《西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17卷，第1期，第45-50頁。

⁴⁸ 《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7卷，第1期，第1-5頁。

⁴⁹ 湯開建、馬明達主編：《中國古代史論集》，第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38-272頁。

⁵⁰ 《早期澳門史論》，第512-535頁。

⁵¹ 黎亦淮主編：《明清海防研究》，第8輯，廣東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92-310頁。

⁵² 王兆春：《圖說世界火器史》，上，解放軍出版社，2014年，第243頁。

⁵³ 尹曉冬：《16-17世紀明末清初西方火器技術向中國的轉移》，山東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24-227頁。

⁵⁴ 馮震宇：《明末西方傳華火器技術研究》，山西經濟出版社，2016年，第95頁。

⁵⁵ 《自然科學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457-483頁。

⁵⁶ 《早期澳門史論》，第312-321頁。

⁵⁷ 《早期澳門史論》，第512-535頁。

⁵⁸ 《歷史研究》2009年第5期，第65-86、191頁。

縣，當地“義民”魏升協助官府，“以佛郎機炮百餘攻之”。³ 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王守仁平宸濠之亂時，曾使用佛郎機作戰。看來，有待深入發掘中外史料，才有可能對這些看來似乎不可能的說法做出新的合理解讀。

2. “堅船”

（1）蜈蚣船

學界對仿造葡人火器的技術比較關注，而同一時期引入的蜈蚣船造船技術及所造之船，雖向為史家所關注，卻鮮有專門研究。研究蜈蚣船的論文數量不可謂多，主要有羅德里希·普塔克著（Roderich Ptak）（德國）“蜈蚣船和葡萄牙人”⁵⁹及《海上絲綢之路》。⁶⁰此文為蜈蚣船和葡萄牙人這個課題研究的開山之作。作者博徵廣引中外史料，注釋及參考書目詳備，立論不失偏頗，堪稱這一領域的基本框架模式論文。劉義杰“蜈蚣船鈎沉”⁶¹為一專題研究，比較全面地回顧了蜈蚣船的學術研究進展，明確地提出了“葡萄牙船說”，即蜈蚣船的原型為葡萄牙的槳帆戰船。他高度評價了仿製蜈蚣船給明代軍事所帶來的影響。譚玉華“汪鋌《奏陳愚見以彌邊患事疏》蜈蚣船辨”⁶²也比較全面地回顧了蜈蚣船研究過程，力主“東南亞船說”。筆者看到，譚文未能參閱台灣一篇很優秀的碩士論文——彭文顯“歐洲軍事武器與東亞的交流——以明代蜈蚣船及叭喇唬船為例”。⁶³另外，作者所引用的葡萄牙文獻也略顯不足。葡屬印度1525年條例規定了葡萄牙東方艦隊的配置，其中槳帆戰船（galé）是艦隊中的標準配置。這種船的本身並沒有甚麼特別之處，與眾不同的是巧妙地結合了多槳和多門火炮，形成了快速和強大的火器攻擊力，造就了一艘高速攻擊快艇。這給當時的中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於是決定予以仿造。20槳以下的稱“galiota（小槳帆戰船）”。這樣看來，到過珠江口的葡萄牙艦隊中肯定配有槳帆戰船和小槳帆戰船。有葡

⁵⁹ 羅德里希·普塔克：《普塔克澳門史與海洋史論集》，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16頁。

⁶⁰ 羅德里希·普塔克著，史敏岳譯：《海上絲綢之路》，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19年，第342頁。

⁶¹ 《國家航海》2018年第20輯，第133-148頁。

⁶² 《海交史研究》2019年第1期，第28-44頁。

⁶³ 彭文顯：“歐洲軍事武器與東亞的交流——以明代蜈蚣船及叭喇唬船為例”，台灣清華大學碩士論文，導師：李毓中，2016年。

葡萄牙文資料顯示，在 1502-1506 年間，在印度的柯枝（Cochim）已經仿造了小槳帆戰船。有葡萄牙古圖顯示，澳門開埠後，也有槳帆戰船和小槳帆戰船停泊在外港水面。之所以產生“東南亞船說”的說法，是因為從中國史籍所載的圖來看，並沒有那麼多的槳，僅有 9 對槳。這正是小槳帆戰船和槳帆戰船的區別所在。總之，蜈蚣船的原生船為葡萄牙的小槳帆戰船為不爭之事實。

是“堅船”、“利炮”和分佈在三大洲三大洋沿海的商棧線支撐其起了“葡萄牙海上帝國”。

（四）經濟貿易

1. 貿易路線

葡萄牙人東來的目的很明確：“尋找香料和基督徒”。香料比喻經商；基督徒即言傳教。葡萄牙人出現在中國沿海就是為了達到這兩個目標。關於早期葡萄牙與中國通商的情況，通史性著作和澳門海上貿易史專著均有敘述。屬前一類的有黃啓臣的《澳門通史》（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 年）比較具有代表性。筆者看到，關於澳門與中國和日本之間的貿易，他主要參考的是謳宗華的幾本 20 世紀 50、60 年代的著作。黃書中的一些觀點不免有可商榷之處，主要是航線問題：1. 回里斯本航線。黃認為，回歐洲是繞好望角，沿大西洋非洲海岸，北航到摩洛哥抵里斯本。這是一條推理的航線，並不是實際的行程。我們知道，從 1500 年開始，葡萄牙人已經發現了巴西航線，即從里斯本到巴西的巴伊亞（Bahia），然後穿越大西洋，繞過“暴風角”（這樣才成為了“好望角”），進入印度洋。這條想像的航路至今可每每見於有關的論述。2. 澳門—馬尼拉—墨西哥航線。1580-1640 年期間，葡萄牙和西班牙兩國共事一主。聯合國王菲利普（Felipe II）二世明令，嚴禁澳門與馬尼拉和墨西哥之間的航行貿易，因此，這條航線並不存在。⁶⁴ 存在的不過是一些違規的商業行為。3. 葡萄牙人參加“廣交會”的年代。黃啓臣認為，從 1578 年起，葡萄牙人獲准每年夏、冬兩季到廣州參加“廣交會”。有確鑿的葡萄牙語史料表明，從 1555 年起，葡萄牙人獲准從浪白滯前往廣州參加

⁶⁴ 金國平：“1584-1585：澳門—阿卡普爾科首航”，《“中國大帆船”與“絲銀之路”——Parían 研究》，第 17-35 頁。

“廣交會”。⁶⁵ 李慶新《明代海外貿易制度》（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對“廣交會”也有較詳的論述。

2. 貿易內容

（1）白銀

從中葡早期貿易的商品構成來看，葡方輸華最主要的商品是白銀。白銀貿易貫穿澳門開埠前後。白銀入華有三條途徑：到伊比利亞半島和從中歐來的白銀，通過好望角航線；從菲律賓來的美洲白銀；從日本來的白銀匯入中國。白銀是中葡之間貿易最主要的商品。從2017年在澳門舉行的“中國歷史上的白銀問題”的研討會⁶⁶起，澳門及中國學術界對白銀是澳門開埠和維持下來最根本的原因有了共識。在使得澳門存在幾百年的諸多因素中，白銀是最主要和最持續的原因，因為對它的需求是一種國家需要。通過安插葡萄牙人於澳門巧妙地分離了中國私商、倭寇和葡萄牙人，保證了中國官方可以在中國的掌控之中，經常不斷地得到這種貴金屬。因此，葡萄牙人在澳門的存在絕不是廣東當局私相授受的結果，而是北京的刻意安排，其目的就是為了穩定地、有保障地獲得白銀。只用此一招，中方實際就把沿海的私人白銀貿易巧妙地納入國家的管理範疇。這代價太小了，給葡萄牙人居住和經商的地方只是一塊彈丸之地。關於白銀問題，可見萬明主編《晚明社會變遷問題與研究》（商務印書館，2005年）及其最新論文“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延伸的新樣態——明代澳門興起與全球白銀之路”。⁶⁷ 關於美洲幣名的考證可見金國平“澳門與美洲白銀——流入中國之西班牙美洲幣名論考”。⁶⁸ 總之，進入中國或通過澳門輸華白銀的總數還是一個需要深入利用外文檔案資料解決的問題。以往的研究多據一些經濟學家的所做的統計數字，而他們又是根據幾本西文著作而得出的數據。

⁶⁵ 金國平編譯：《西方澳門史料選萃 15-16 世紀》，第 273-274 頁。

⁶⁶ 萬明：“‘中國歷史上的白銀問題’國際學術研討會總結”，《中國錢幣》2017 年第 3 期，第 76-79 頁。

⁶⁷ 萬明：“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延伸的新樣態——明代澳門興起與全球白銀之路”，《南國學術》2020 年第 1 期，第 154-162 頁。

⁶⁸ 《“中國大帆船”與“絲銀之路”——Parían 研究》，第 1-16 頁。

(2) 瓷器

中方輸出最重要和大宗的商品是瓷器。早期青花瓷以景德鎮的產品為主，逐步為所謂的“克拉克瓷”替代。金國平考證出“克拉克瓷”便是“漳州瓷”。⁶⁹ 關於青花和“克拉克瓷”的論文很豐富，主要有金國平、吳志良“流散於葡萄牙的中國明清瓷器”、⁷⁰ 萬明“海上尋踪：明代青花瓷的崛起與西傳”⁷¹ 等。

(3) 珍珠、絲綢與棉布

“海上絲綢之路”，其實名不副實。絲綢所佔的比重極小。只有少部份上層人士買得起。根據目前見到的葡萄牙文資料，至少至1525年，葡萄牙人經銷的最主要的中國商品是“中國異形珍珠 (aljofar da China)””。到1554年，才出現了“中國絲綢 (seda da china)”的紀錄。之所以特別強調“中國絲綢”，是因為葡萄牙人不僅僅販賣中國的絲綢產品，也有其他亞洲地區的物品，如“霍爾木茲絲綢 (seda da china e ormuz)””。故知，“海上絲綢之路”經銷的並不完全是中國絲綢。更大宗的輸出織品是棉布——“松江布”。⁷²

(4) 茶葉

早期中葡貿易並不包括茶葉。茶葉雖是通過葡萄牙人傳入歐洲的，⁷³ 但卻是英國人將其普及開來。

(5) 糖和糖漬品

學術界還未重視中葡貿易中的糖和糖漬品的交易。其實，這很重要，因為在當時的歐洲只有一個甜源——蜂蜜。對於他們來講，糖是一個新口味，故白糖當時在歐洲被稱為“白金”，其貴重之程度可想而知。

⁶⁹ 金國平：“伊比利亞文獻所見‘克拉克瓷’名實考”，《澳門學：探蹟與匯知》，第133-150頁。

⁷⁰ 《故宮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3期，第98-112頁。

⁷¹ 《國家航海》2013年第1期，第122-133頁。

⁷² 金國平：“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語中關於‘松江布’的記載及其吳語詞源考”，《史林》2015年第1期，第52-60、220頁。

⁷³ 金國平：“澳門與葡萄牙語世界‘茶文化’的興起”，《澳門學：探蹟與匯知》，第113-132頁。

三、關於中葡關係研究的思考與展望

綜上所述，經過 40 年的不斷探索和累積，中國學界對中葡關係史的研究取得了相對豐碩的成果與進步，但似乎同它的歷史重要性還不成比例。總體而言，葡萄牙人的東來改變了世界歷史的進程，也極大地影響了中國歷史的走向。葡萄牙人勇敢地掀起了全球化的第一波，中國也隨之融入了世界一體化的步履。相比澳門學的蓬勃發展，中葡關係的研究似乎還缺乏一部整體性著作，來跟踪葡萄牙人在華南的足迹，以闡釋中葡關係的發展過程及對中國歷史所產生的深刻影響。應該看到，在澳門回歸效應之後，目前的中葡關係及澳門學研究略呈減速之勢。在此情況下，當務之急是要制定一個負面清單，明確哪些科目未做，哪些需要深入。這樣才能更有計劃，更有步驟地持續推進中葡關係及澳門學的研究。